

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Hegemonic Structure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一般來說，「霸權」的出現不僅是國際關係中的慣常現象，甚至也是國際秩序穩定與否的關鍵之一；因此，從霸權興衰或更迭角度來進行觀察，也是我們瞭解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本文當中，便試圖以東亞地區為例，首先從歷史面著手，勾勒出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從中國、英國、日本到美國的不同霸權階段變化，接著比較其維繫霸權地位政策的差異所在，然後進一步將焦點放在後冷戰時期以來的發展上，希望能進一步釐清東亞的權力分配現況。最後，本文也試圖從結構現實主義與自由制度主義等不同研究途徑的對比，藉以預測東亞安全環境的未來走向。

Generally speaking, so-called “great power” or “hegemony” is not just only a usual phenomen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n important issue to judge the stability of global order. Therefore, it is a key approach for us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hrough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or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will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hegemony with the modern history of East Asia since 1842, and try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hegemonic policies among China,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n, we will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describe further the condition of power distribution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Finally, we also hope to forecast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security circumstance by contract between structural realism and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關鍵詞：東亞、霸權、權力轉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

Keywords: East Asia, hegemony, power-transition theory, structural realism,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壹、霸權、霸權結構與國際秩序

在國際政治史上，所謂「強權」(great power)或「霸權」(hegemony)國家的存在儘管是相當普遍且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當中，暫且不論其興衰原因為何，¹根據所謂「霸權」國家出現的先後，其實存在著相當不同的形式，我們姑且將其分別稱為「古典型霸權」(Classic-style)與「歐洲型霸權」(European-style)，其時間分野約略是在15至16世紀之交，亦即一般所稱的「地理大發現」時代前後。主要差異在於，古典型霸權的出現固然也可能與某種莫名的擴張慾望有關，但擴張原因其實更大部分地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亦即希望透過不斷的征伐來徹底解決可能的邊境威脅；²其後，憑藉著軍事優勢（或者再加上文化優勢），它們自然也成為區域體系規範的締造與捍衛者（例如由中國所建立的朝貢體系等），從而鞏固其霸權地位。

相對地，所謂歐洲型霸權則顯然與宗教革命及資本主義有密切關聯；前著為歐洲擴張的部分層面（例如全球傳教運動）披上人道外衣，同時也成為後來理想主義(idealism)外交政策的根源，至於後者則直接訴諸人類的物質慾望，從而也成為現實主義(realism)政策或全球化(globalization)潮流的源頭之一。³與古典型比較起來，歐洲型霸權非但有許多民間企業家也積極投入擴張過程，甚至國家經常所扮演者有時也僅是捍衛既得商業利益的消極公共財角色而已（參考表1所列）；⁴更重要的是，歐洲型霸權在擴張過程中不僅相當重視體系規範（特別指國際法）的落實，同時在規範制定過程中也更主觀且缺乏包

¹ see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Kenneth A. Oye, "Constrained Confi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agon Foreign Policy," in Oye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Reago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p.3-40.

² 例如來自色雷斯、伊里亞與希沙利人的威脅構成馬其頓擴張的原因，為迎戰高盧人與迦太基人，於是開啟了羅馬的擴張時期，而自匈奴、突厥乃至於蒙古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也一再引發中國往西北邊疆征伐。

³ 若干學者認為宗教因素在早期帝國建立過程中不僅是擴張因素，也是正當化來源；see Majid Tehrania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Do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Discourse*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17-18.

⁴ 蔡東杰，〈美國霸權變遷與兩岸關係發展〉，《政治學報》，第36期（2004），頁87。

容性。⁵

表 1：霸權模式分類及其比較

| 霸權模式 | 古典型霸權 (before 1498) | 歐洲型霸權 (1498-1945) * | 現代型霸權 (after 1945) ** |
|------|------------------------|------------------------|--------------------------|
| 代表國家 | 馬其頓、羅馬、中國、 蒙古 | 西班牙、荷蘭、英國 | 美國 |
| 權力基礎 | 軍力 | 軍力、經濟 | 軍力、經濟、文化 |
| 擴張原因 | 狹義安全觀、權力慾 | 廣義安全觀、獲利、優越感 | 獲利、普世主義 |
| 經濟型態 | 游牧、農業 | 工業（製造業） | 知識產業 |
| 正當來源 | 武力鎮壓、文明差距 | 國際法 | 意識型態認同 |
| 政策重點 | 征服、階層性威望 | 殖民、建立國際規範、制衡 | 同質化、爭端解決*** |
| 體系特色 | 帝國架構 | 國際法（國家）體系 | 全球化網路社會 |
| 穩定挑戰 | 政治腐化、軍備廢弛 | 軍備競賽、經濟停滯 | 軍備擴散、文明衝突 |

*1498 年：Columbus 在第三次航行中首度登陸美洲大陸，da Gama 也於同年越過好望角。

**1945 年：美蘇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即展開全球性冷戰對峙。

***此處所列乃各種特殊霸權模式所使用的政策重點，並不表示其他模式不使用類似政策。

正如表 1 所列，前述所謂古典型與歐洲型霸權的區分並不僅在形式與手段的差異而已，更重要的還是其「權力要素」問題；亦即在古典型階段，「軍事」力量仍此時期霸權國家必備的最關鍵要件，不過，後起的歐洲型霸權非但影響力更廣泛，與其他國家間權力差距更懸殊，在持續性上也更悠久；其緣故在於歐洲型霸權因加上「經濟」要素而成為新的「雙重霸權」（dual hegemony）型態。⁶儘管如此，其實歷史上並沒有任何霸權國家能恆久存在下去；⁷由於霸權

⁵ see Victor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 other Culture in the Imperial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⁶ see Philip D. Cu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

與其他國家間的權力差距經常會因種種因素而被拉近，從而也帶來「建立—危機—解體—重構」之循環性結構重組效果（見表2所列）。⁸

表2：霸權轉移與國際政治變化

| 霸權建立階段 | 霸權危機階段 | 霸權解體階段 | 霸權重構階段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立正當性 • 體系範圍擴張 • 強制落實體系規範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全球競爭激化 • 不滿現狀者崛起 • 相對優勢衰退 • 權力要素出現質變或 追趕者取得關鍵技術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霸權國家政策退縮 • 同盟競賽增溫 • 國際衝突事件頻傳 • 關鍵武裝技術擴散或 爆發大規模戰爭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研擬新國際規範 • 體系再造 • 國際秩序趨穩 |

無論如何，所謂「霸權」絕非僅是種用以說明權力差距的「描述性」名詞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意義。一般來說，「穩定勢力範圍內的國際秩序」可說是用來檢驗霸權政策的最主要方向，⁹至於其細部內涵則可包括：壓抑潛在霸權對手（戰略性圍堵或發動侵略戰爭）；透過制定規範（國際慣例、國際法或國際建制）維持體系內總體均勢；避免或控制體系內危機（介入調停）並阻止戰爭與衝突爆發（軍事干預）；推動威望措施來鞏固主導地位（整合倡議、軍事演習或共同政策目標）等。¹⁰換言之，除了權力差距所彰顯的「相對客觀性」外，所謂霸權國家還須以實際行動，在「絕對主觀性」方面補足定義要求；事實上也唯有在這雙重條件均符合的情況下，進一步討論霸權結構變遷才是有意義的。

⁷ See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⁸ 有些人特別關注於其中的「循環」(cycle)現象；見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年)，第10章的介紹，並參考Richard Rosecrance,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1987), pp.288-296.

⁹ 部分霸權穩定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者似乎較重視霸權對「經濟」而非「政治」秩序的維持；see Charles P. Kindleberger, *World Economic Primac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7-41, and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1967-1977," in Ole Holsti, Randolph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pp.131-162.

¹⁰ see also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00-201.

當然，我們不僅希望透過對於行為內容的清楚定義，以便能深入觀察霸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本文也企圖以東亞地區為例，期盼發掘並說明霸權變遷的過程與原因。大致來說，所謂「霸權結構」指的通常是某種呈現金字塔型的權力分配模型，此種概念大致可說放諸四海而皆準，只不過差別出現在權力內涵（政治性或經濟性）與結構型態（緊密或鬆散）等方面。無論如何，我們更關切的問題是：究竟為什麼或在什麼狀況下會產生霸權更迭的情況？

從「權力轉移理論」(power-transition theory)的角度來看，霸權更迭很難不是國際衝突的因變數，至於國際間爆發衝突的原因，又不外乎是國家間的權力對比出現均衡 (parity) 或甚至超越 (overtaking) 現象所致。¹¹其中，所謂均衡指的是後進者或潛在挑戰者的權力值，逐漸拉近與霸權國家距離的意思；從另一個角度看來，亦即挑戰者完成了「追趕」政策（這通常暗示其經由成功的經濟成長而提升其軍備競賽與政治影響力）。¹²至於超越則是指，潛在挑戰者不僅有效地拉近與霸權國家間的權力差距，甚至透過某種躍進式的發展，導致其能力還凌駕於原先霸權國家之上。¹³權力轉移理論進一步指出，國際衝突的爆發點往往便發生在，由於出現「客觀」的均衡或超越現象，以致影響相關國家對於國際權力分配現狀之「主觀」看法的時候。換言之，當原先持現狀政策者不再滿意於既存的權力規則時，無論霸權國家或挑戰者都可能透過發動「先制攻擊」，以便取得對於未來秩序的優先發言權。在這種情況下，正如表 2 所示，一旦原先的霸權國家無法有效處理類似權力鬆動問題，那麼霸權解體 (decomposition) 與後續的權力結構調整 (structural adjustment) 也就成為無可避免的結果。以下，我們便以東亞的區域發展為例，來說明此一過程。

¹¹ see A.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Manus Midlarsky,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and Jacek Kugler, et al.,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2000) .

¹² Moses Abramovitz, *Thinking about Growth and other Essay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Wel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p.220-242.

¹³ Elise S. Brezis, Paul R. Krugman, and Daniel 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1993), pp.1211-1219.

貳、近代東亞霸權結構變遷歷程

爲進一步釐清前述概念，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先把焦點放在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東亞區域霸權結構變化上。至於其結構內涵的變遷概況，則大致可粗分爲下表所示的四個階段：

表 3：近代東亞霸權變遷過程比較

| | 第一階段 | 第二階段 | 第三階段 | 第四階段 |
|------|--------------|--------------|------------|-----------|
| 霸權國家 | 中國 | 英國 | 日本 | 美國 |
| 稱霸時段 | 1842 以前 | 1860-1905 | 1918-1941 | 1945-1989 |
| 衰退前兆 | 1826 逆差出現 | 1894-95 甲午戰爭 | 無 | 1969 關島主義 |
| 崩解關鍵 | 1839-42 鴉片戰爭 | 1904-05 日俄戰爭 | 1941 太平洋戰爭 | 1989 亞太整合 |
| 調整階段 | 1842-60 | 1905-1918 | 1941-1945 | 1989 迄今 |
| 霸權終點 | 1860 英法聯軍 | 1918 一戰結束 | 1945 二戰結束 | - |

儘管在漫長的歷史過程裡，中國受制於週邊遊牧民族的時間，並不見得少於作爲東亞體系核心的階段，一方面在中國強盛時，基於文明優越感而來的天朝觀念固然其來有自，但即使在中國屈於弱勢時，由於蠻族多未能真正滅亡中國，生於憂患的民族主義精神也經常成爲「中國中心說」的根基。¹⁴無論如何，在歐洲國家挾工業革命實力再度東來之前，時值清代中葉的中國無疑居於東亞地區的霸主地位。爲捍衛霸權，中國也使用了一套相當複雜的外交政策來處理其對外關係，例如經常派兵前往邊陲地區爲體系內行爲者排解糾紛，利用官僚行政系統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動漢化政策，將皇帝神格化後提供臣民行爲表率，利用宗教力量（例如在西藏地區）作爲懷柔力量，對於在武力與行政系統影響範圍外的地區運用利誘政策，最後還包括巧妙地運用「以夷制夷」的分化政策等。¹⁵在中國霸權時期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其階層性的區域體系特徵，正如

¹⁴ 蔡東杰，《中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0年），頁39。

¹⁵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濱下武志所言：「朝貢的根本特徵在於它是以商業貿易行為進行的活動，換言之，因朝貢關係而使得以朝貢貿易關係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得以形成。」¹⁶進一步來說，由於有豐厚「回賜」慣例作為誘因，不但是中國週邊的東亞國家，甚至連遠在千里的歐洲國家也願意接受此種體系規範而加入這套網絡當中。

無論如何，中國的霸權角色由於在鴉片戰爭中落敗而遭到挑戰。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儘管有人認為是由於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對中國所持階層性國際觀的反動所引起的，亦即目的在於爭取平等權；¹⁷但正如費正清所言：「由於工業化的西方在技術、組織能力與軍事力量等方面均迅速走在世界前列，致使亞洲已不能望其項背；而此種力量對比的變化與差距的不斷拉大，勢必導致中國對外關係的變革。」¹⁸不過，此種說法雖較具國際觀，但仍未抓到重點；事實上，由於工業革命導致生產量暴增，使得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工業國家有著必須開拓新市場以解決其發展問題的必要與急迫性，從戰後和約內容看來，這或許才是戰爭爆發的主因。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英國順利透過戰爭而達到開放中國門戶的核心目標，但因當時它仍缺乏有效的長程權力投射能量，以彌補身為「境外霸權」的地理特色，因此直到 1860 年第二次英法聯軍結束後才真正終結中國霸權，取得在東亞地區的優先發言權。

英國霸權時期的來臨，既終結了長期以來由東亞國家自己來擔任區域霸權角色的時代，同時也暗示全球化浪潮對此地區所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在 1760 到 1830 年間，英國不僅佔有歐洲工業產量的三分之二，同時期英國在全球製造業生產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從 1.9% 躍升到 9.5%，其後到英國權力鼎盛期（同時也取代中國在東亞霸權）的 1860 年前後，此數字更攀向 19.5% 的高峰。此種情況一方面說明了英國何以有能力從歐洲一隅控制遙遠的東亞，也點出東亞地區已被鑲嵌進全球貿易體系格局的現實。很明顯地，英國既因起於歐洲的原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¹⁶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38。

¹⁷ Hosea B. Morse and Harley F. M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1931) , Chapter 5.

¹⁸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p.454.

因(殖民主義與工業革命)而來到東亞,也由於歐洲本身的問題(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區域內部鬥爭)而被迫削弱了它在東亞的影響力。進一步來說,由於歐洲國家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尤其是1871年統一後德國對英國所產生的挑戰),終於迫使英國在1902年選擇與日本締結同盟,從而終結了該國將近百年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所以選擇與日本締結同盟,除暗示後者即將成為東亞新興勢力之外,其實也因為日本的確有條件讓英國作出此種思考。早自室町幕府時代以來,日本歷代將軍雖總是要求與中國建立冊封關係,卻又力圖建立與朝貢體系相抗衡的「大君外交體系」;¹⁹至江戶末期起,部份日本學者更開始突破長期的鎖國思想,提出諸如富國強兵論、日本主義精神與所謂「海外雄飛論」等積極想法,並鎖定東亞大陸作為其未來的主要擴張目標。²⁰與歐洲國家不同的是,日本的擴張思想不僅融合民族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基本概念,同時還自我覆蓋了一層濃厚的道德色彩,亦即他們在亞洲大陸的擴張非但旨在協助日本與其週邊國家掙脫西方政經制度的桎梏,並且在更深的層次上希望能恢復天人間的和諧關係。²¹儘管如此,擴張行動本身無可避免地必然是軍事性的,至於其關鍵發展則是爆發於1894-95年間的甲午戰爭。

在此,我們所以把甲午戰爭視為英國在東亞霸權衰退前兆的原因是:阻止潛在競爭者崛起並維持體系內權力平衡現狀,本是霸權政策的基礎;但英國在朝鮮問題上卻顯然扮演相當消極的角色,只要能確保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不變,並阻止俄國勢力南下,英國決定放任日本在半島的侵略行為。²²從某個角度來看,英國在甲午戰爭過程中的置身事外,固然已使其霸權角色大打折扣,其後當日俄戰爭的斡旋者居然由美國擔任時,更使其霸權地位為之動搖。至於最後一擊則來自第一次大戰的影響。在歐洲各國無暇東顧的情況下,企圖趁機攫取

¹⁹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18。

²⁰ 陳豐祥,《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頁23-24。

²¹ Kenneth G. Henshall, *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13.

²² 英國在1890年決定放棄在日本特權並與其簽訂平等新約的舉動,便顯出某種讓步跡象;參考吳木生主編,《東亞國際關係格局》(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7-8。

霸權地位的日本便極力說服各國接受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結果是俄國在 1916 年的密約中承認日本可擴張在滿洲的特權，英國在 1917 年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與部份太平洋島嶼特權的要求，而法國與義大利隨後也作出與英國類似的承諾。²³儘管美國對日本諸如提出「廿一條要求」等行為表示異議，²⁴但仍無法阻止日本在戰後取得東亞霸權地位。

儘管如此，某種現實還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亦即日本在 1918 年後雖似乎取得東亞霸權地位，但這絕非暗示它沒有其他的對手。主要原因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未徹底解決歐洲主要強權間的矛盾，以致各國在戰爭表面上結束後仍需埋首備戰，從而使東亞地區出現日本有機可趁的權力真空狀態。從日本在 1934 年「天羽聲明」中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的宣示可以看出，²⁵正如 1823 年美國發表「門羅主義」一樣，他們所以提出此種宣告的緣故，正在於無法實際捍衛其目標，因此僅具政治象徵意義；至於 1921-22 年間的華盛頓會議，則直接指出歐美各國希望透過國際力量壓制日本野心的企圖。為突破前述困境以確實鞏固霸權地位，日本當然得全面利用此種真空狀態來進行擴張，²⁶例如在 1937 年所爆發的中日戰爭，儘管最初不無意外性質，²⁷但日本軍方仍決定利用此一契機全面擴大對中國的攻勢，並隨即與德義兩國談判簽署三國同盟以便保持戰果。

正如我們在表 3 中所指出的，和中國、英國與美國不同處在於，日本的霸權時期似乎找不到衰退前兆。其主要原因或許是由於日本霸權發展起落過於迅速的緣故，而這非但反映出其地位的不穩定性，實際上也凸顯出在某種全球政治現實之下，日本所擁有霸權的虛幻性。正如 Schulzinger 描述的，美國早在

²³ see W. G. Beas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0) .

²⁴ Robert Storr, *A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 p.153.

²⁵ 此聲明由日本當時的外交部發言人天羽英二提出，故有此稱呼；參考蔡東杰，前引書，頁 212；John K. Fairbank, et al., *op. cit.*, p.307.

²⁶ 日本國內對擴張途徑其實也有爭議，例如外交與財政部門希望以與西方合作為前提，但軍方則企圖直接挑戰西方以建立帝國；Warren I. Cohen, *East Asia at the Cen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p.307-308.

²⁷ S. Kitaoka, "Diplomacy and Military in Showa Japan," in C. Glunk and S. Graubard, eds. *Showa: The Japan of Hirohito*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 p.165.

1898-1908 年間便開始邁向世界性強權之路，²⁸只不過因「保守性國際主義」作祟而使其角色受到限制，其結果是德國與日本得以利用此種權力真空狀態分別在歐洲與東亞崛起。不過，隨著美國決定全面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述局面同時扭轉，至於東亞也再度被區域外力量拉進全球化浪潮當中。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我們將 1945 年後的東亞區域情勢稱為「美國霸權時期」，但此種霸權絕非是無可辯駁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冷戰爆發的關係，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在 1972 年開啓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之前，其實多數僅限於西太平洋島鏈以東的地區，在東亞大陸上大概只對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有部份發言權而已。

表 4：東亞地區霸權政策比較

| | 中國 | 英國 | 日本 | 美國 |
|-------|---|---|--|---|
| 壓制性政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發動擴張戰爭 邊疆漢化政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發動壓制戰爭 簽署不平等條約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發動擴張戰爭 爭奪殖民地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發動壓制戰爭 建立圍堵網 |
| 規範性政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建立朝貢制度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推動國際法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國際分工原則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意識形態正當性 |
| 均勢性政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介入調停 出兵協助抗敵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介入調停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無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介入調停 出兵協助抗敵 |
| 威望性政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皇帝神格化 宣揚天朝觀念 華夷體制結構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宣揚自由貿易觀 歐洲利益代表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亞洲門羅主義 大東亞共榮圈 天人合一思想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聯合演習與駐軍 民主普世價值 世界一家思想 |

在上面的表 4 當中，我們企圖針對東亞地區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四個不同的霸權階段作一個簡單的比較。首先，回應本文在第一個段落中關於霸權客觀與主觀定義上的要求，我們發現無論中國、英國、日本或美國，在它們擔任霸權角色時無疑均具備相對的權力要素，同時從主觀面看來，也確實擬定並實踐了一系列的霸權政策，包括壓制敵對或挑戰勢力、制定並推廣體系內規範、維持體系內部權力均勢，以及透過威望政策以鞏固其霸權地位等。其中，

²⁸ see Robert D. Schulzinger, *U.S. Diplomacy since 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2.

日本由於擔任霸權期間相對較短，同時霸權地位也不無疑慮，因此並不能發現它有明顯的均勢政策存在。此外，除了英國的霸權純然以現實主義思想作為其基礎外，其他三個階段的霸權多少都披上一點理想道德主義的外衣。最後，從表 3 與表 4 可看出，無論是霸權的興衰起伏或霸權政策的運作，都很難與軍事手段（亦即發動戰爭）脫離關係，這或許也是我們可進一步深思之處。

參、後冷戰時期東亞的大國結構變化

儘管東西方冷戰的結束與波斯灣戰爭的勝利，似乎讓美國得以逐步鞏固其作為全球唯一軍事霸權與政治領導者的地位；但於此同時，美國用以支撐此一單極地位的物質基礎，亦即美國的經濟，卻也在進入後冷戰階段之際因財務與國際收支赤字的雙重惡化、景氣長期低迷與龐大的債務壓力，看來似乎難以繼續負擔巨額的霸權義務。例如就在冷戰結構瓦解之際，美國便自 1990 年 7 月起開始面臨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九次經濟衰退，而且由此持續到 1992 年大選前夕為止，從而埋下布希敗選的原因之一。²⁹ 此種背景同時也是我們所以在表 3 中，將 1989 年迄今視為美國霸權調整時期的原因。

事實上，如同在表 3 中同時指出的，美國霸權衰退的前兆早在 1969 年便露出端倪，此即以「關島主義」或「尼克森主義」為名的政策指導方針，至於其內涵則是以「亞洲和平」為目標，以「亞洲自決」為手段，然後逐步地讓美國從領導退居到合作的立場上。³⁰ 從某個角度來看，Nixon 此舉可說是直接面對美國發展困境的現實作為；例如他雖一再重申對盟邦的承諾，但實則不斷降低承諾的重要性，亦即不再強調美國的國際警察義務，轉而著重其有限參與角

²⁹ 李文志，〈美國的亞太戰略：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收於許介麟等，《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業強出版社，1994 年），頁 74；王緝思等，《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台北：生智出版社，2001 年），頁 50。

³⁰ Melvin R. Laird, "The Nixon Doctrine: From Potential Despair to New Opportunities," in Laird, ed. *The Nixon Doctrine* (Washington, D.C.: Town Hall Meeting, 1972), p.3;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69-7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36-37.

色，³¹一旦東亞發生動亂，美國將提供物資與技術援助而非地面部隊，換言之，美國自此將責任轉移到東亞自身的區域集體安全機制發展上，³²目的是讓美國能藉由「以談判代替對抗」的途徑，由冷戰桎梏中解套。而1989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的成立更可說是美國調整其霸權的關鍵，因為這暗示美國同意以「多邊整合」取代「單極領導」途徑，和平漸進地轉換在東亞地區的政治角色。至於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東亞戰略首先凸顯在布希時期國務卿 Baker 提出的「新圍堵政策」上，他主張美國應透過政治面的人權外交，經濟面的亞太經濟合作，與安全面的多邊論壇形式，來保障美國的政經利益。³³在 Clinton 主政之後，更以此為基礎在1993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倡議，希望從美日同盟關係、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亞太多邊安全體系、中美間關係的全面交往、美國對亞太地區經貿關係，以及民主化的普世價值等出發，建立起「合作性交往」（Cooperation Engagement）的新夥伴關係。³⁴

事實上，美國在東亞霸權地位所以進入調整期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正如前述般，美國國力的相對衰退跡象，再者來自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對於東亞或亞太地區的戰略變化，最後則是由於此區域內部均勢結構變遷所致。其中，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戰略選擇上，顯然陷入新現實主義與新理想主義，以及新孤立主義與新全球主義的二元爭辯與對立當中；前一種爭辯涉及美國到底應按照地緣政治觀點來重組全球聯盟，還是應作為「民主和平論」基本價值的捍衛者，³⁵而後一種爭辯則涉及美國到底應縮減海外駐軍並置身於國際衝突之外，還是應該設法建立後冷戰時期的集體安全體系，以避免出現一個充滿混亂與暴力的世界。³⁶從某個角度來看，美國因陷入爭辯而無法歸納出長期戰略的結果，一方

³¹ Alan Jones, Jr., "Nixon and the World," in Alan Jones, Jr., ed.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3), p.24.

³²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raeger, 1973), p.276.

³³ James Baker,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70:5(1991), pp.1-18.

³⁴ President Clinton,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Dispatch*, 4:28(1993), pp.485-488.

³⁵ see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and Zeev Maoz,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2:1(1997), pp.162-198.

³⁶ Arthur Schlesinger, Jr., "Back to the Womb: Isolationism's Renewed Threat," *Foreign Affairs*, 74:4(1995), p.8.

面既是後冷戰時期以來該國外交政策經常陷入矛盾衝突的原因，從東亞區域發展來看，則亦不啻提供其他潛在霸權競爭者趁機進行合縱連橫的運作空間，至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的朝向多極化發展，也使美國對國際事務的「管理」愈發困難。³⁷

表 5.1：當前東亞潛在霸權基本國力比較

| | 人口 (million) | 面積 | 平均壽命 (y) | 識字率 (%) |
|----|--------------|------------|----------|---------|
| 美國 | 293.0 | 9,631,418 | 77.4 | 97.0 |
| 中國 | 1298.8 | 9,596,960 | 71.9 | 90.9 |
| 日本 | 127.3 | 377,835 | 81.0 | 99.0 |
| 俄國 | 143.8 | 17,075,200 | 66.4 | 99.6 |
| 印度 | 1065.1 | 3,287,590 | 64.0 | 59.5 |
| 印尼 | 238.4 | 1,919,440 | 69.3 | 87.9 |

註：表中資料為截至 2003 年底的估計值，由作者自行製表。

表 5.2：當前東亞潛在霸權基本國力比較（續）

| | GDP (billion) | 平均所得 (PPP) | 軍備支出 (billion) | 軍備人口 (million) |
|----|---------------|------------|-------------------|-------------------|
| 美國 | 10980 | 37800 | 371 | NA |
| 中國 | 6449 | 5000 | 60 | 208.1 |
| 日本 | 3567 | 28000 | 42 | 25.2 |
| 俄國 | 1287 | 8900 | NA | 30.6 |
| 印度 | 3022 | 2900 | 14 | 172.1 |
| 印尼 | 758 | 3200 | 1 | 38.7 |

註：軍備人口指 16-49 歲間適宜被動員的人口估計值。

³⁷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 for Peace* (New York: The MIT Press, 1994), p.281.

在上面的表 5.1 與表 5.2 中，我們列舉了幾個有機會繼承美國在東亞霸權地位的潛在競爭國家，當然，所謂機會多寡可能因實力變化而有差距。首先可看出的是，美國雖在多數競爭指標中依舊維持著優勢的地位，但若干其他國家短期內或許沒有「超越」的可能性，仍顯現出「追趕」態勢，例如由於人民幣匯率被刻意壓低，因此始終無法正確估計經濟實力的中國便是其中之一。³⁸根據某些學者的看法，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的話，中國的平均每人 GDP 已由 1978 年的 500 美元躍升至 2003 年的 5000 美元，至於 GDP 總額也可望在 2025 年與美國並駕齊驅。此外，包括在 1979-1993 年間高達 16.8% 的奇蹟式平均成長率，以及儘管有共產集團垮台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壓力，中國仍能抗拒政治性結構調整等事實，都指出中國將成為美國權力地位新競爭者的趨勢。³⁹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僅擁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客觀條件，甚至也有著準備加入競爭的主觀積極作為，包括：推動「大國外交」以提高國際地位，推動「週邊外交」以塑造更安全的崛起環境，推動「博鰲論壇」提供亞洲國家溝通管道，推動建立「上海組織」此一準集體安全機制，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作為東亞經濟整合先驅，推動「海洋國土」概念並研擬「和平崛起論」以塑造介入週邊事件的正當性……等，都可說是明顯例證。

除中國外，日本由於身為東亞經濟大國，其動向也頗受矚目。自 1957 年外交藍皮書中發表所謂「亞洲一員」政綱後，日本便積極透過雁行經濟體系的擘畫來重構其對東亞的影響力；在 1980 年代中期後，諸如「回歸亞洲」或「脫美入亞」等口號更不時見諸報章，提醒日本應在美國與東亞區域整合間扮演一定的橋樑角色。⁴⁰由此，日本不僅自 1980 年代起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並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 1990 年代後更以「政治大國」對為努力目標，⁴¹相繼提出「建立日美歐三極世界」與「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秩序」等主張。

³⁸ Ezra F. Vogel,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p.143.

³⁹ see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78:3(1999), pp.29-32.

⁴⁰ 姚文禮，〈簡論冷戰時期日本對外政策調整〉，《日本學刊》，1994 年第 1 期，頁 67；梁云祥與應霄燕，《後冷戰時代的日本政治、經濟與外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139-45。

⁴¹ 李寒梅等，《21 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102-106。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日本依然是東亞最重要的經濟強國（甚至軍事強國），同時不斷從經濟整合面著手來建立優先發言權，但其國際地位的提升仍存在著幾個隱憂：首先是東亞各國對日本二次大戰期間軍國主義擴張的陰霾未去，其次是日本自 1990 年代以來便陷入長期的泡沫經濟衰退期當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由於「日美基軸外交」迄今還是日本對外政策的主要指導原則，換言之，如果無法擺脫作為美國附庸國的身分，當然會直接影響其在東亞的角色轉換。

從觀察後冷戰時期東亞霸權結構變化的角度看來，「中美日」三角關係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焦點。⁴²其中，企圖繼續維持霸權地位的美國希望透過同盟經驗與所謂「中國威脅論」來拉攏日本，中國希望藉由單一市場龐大商機與東亞整合前景來利誘日本，至於日本則力圖建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希望讓中美日關係朝向「等邊三角形」結構邁進；儘管有人認為，當前東亞地區已形成中美對峙的兩極格局，而此種結構也有利於區域的穩定發展，⁴³但中美日三角關係的未來仍可說充滿不確定的變數。

如同我們在表 5.1 與 5.2 中所暗示的，除中美日三國外，足以影響東亞未來權力結構變遷者其實還包括俄羅斯、印度與印尼等國。首先，儘管印尼在這場競賽中僅扮演著極邊陲性的角色，但一方面它與其他五個參與者一樣，都是人口破億的廣土眾民國家，同時在東南亞國協（ASEAN）中有相當重要的角色，⁴⁴更重要的是，由於其複雜的人口組成（超過 300 個族群與 500 種語言）與身為全球最大回教徒國家的身分，即便它無法正面影響未來東亞結構重整的過程，也可能以負面的「火藥庫」角色埋下不穩定的因素。

其次，在俄國部份，該國外長在 2000 年初所發表一篇名為「俄羅斯與當前世界：世紀之交莫斯科的對外政策」的文章中特別指出，俄國不僅不反對 21 世紀將是亞洲世紀的說法，同時也正加緊介入亞太地區的整合進程，因為

⁴² 時殷弘，〈中美日三角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1 期；楊伯江，〈中美日三角：利益磨合與良性發展前景〉，收於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主編，《亞太戰略場：世界主要力量的發展與角逐》（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頁 303-324。

⁴³ Robert S. Ross，〈21 世紀東亞的力量均衡：兩極結構的穩定性〉，收於張蘊嶺主編，《21 世紀世界格局與大國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99-109。

⁴⁴ see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in ASEAN: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

「不管過去、現在或未來，俄羅斯都是亞洲強國之一」；⁴⁵在同年 3 月聯邦安全會議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中，也大幅提升亞洲在俄國對外戰略當中的重要性。至於在實際作為方面，俄國在 Yeltsin 時代便開始將亞太地區的重要性與對 G-7 關係以及對歐洲關係並列，⁴⁶自 Putin 時代起更積極加入亞太的區域安全對話機制（東北亞的六方會談與東南亞的東協區域論壇），同時也在中國與日本間透過「能源外交」（油管路線爭議）來達到縱橫俾闔之目的。由於俄國同時與中日美三國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設性夥伴關係」與「成熟友誼與夥伴關係」，⁴⁷這不僅讓它深深地鑲嵌在東亞權力結構當中，也讓此區域的未來變得愈加複雜化。當然，由於俄國的地緣環境（橫跨歐亞大陸）相當特殊，因此對歐關係勢必也將牽制住該國的部份能力。

最後是印度的影響。在進入 21 世紀後，人口數已超過 10 億大關的印度非但成爲僅次於中國的第二人口大國，甚至成長率迄今仍無控制跡象（預估 2050 年左右將超越中國大陸）；其次，若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則印度生產總值僅次於美國、中國、日本與德國，名列世界第五位；再加上自 1998 年後成爲全球正式擁有核子武器的六國國家之一，印度的邁向大國之路似乎相當明顯。在此基礎上，印度一方面不斷加強對於印度洋的控制能量，⁴⁸同時也利用美國意欲在冷戰後建立世界新秩序，⁴⁹與對抗中國威脅論等戰略企圖，⁵⁰重新修復對美關係；此外也透過與東協展開另一個「十加一」談判，側面介入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同時在 2004 年 7 月還邀集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不丹和尼泊爾等七國領袖舉辦首次的高峰會談，尋求建立一個共 13 億人口的自由貿易區。從前述作為看來，印度確實有加入稱霸競賽的積極作為；儘管如

⁴⁵ 轉引自陳峰君與王傳劍，《亞太大國與朝鮮半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55。

⁴⁶ Andrew Felkay, *Yeltsin's Rus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Praeger, 2002), p.258.

⁴⁷ 關於其複雜內涵，請參考張蘊嶺主編，《夥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⁴⁸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

⁴⁹ see Richard N. Haass and Gideon Rose, *A New U.S. Policy toward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7) , and Slivaji Ganguly, *U.S.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

⁵⁰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南亞政策》（台北：生智出版社，2003 年），頁 198。

此，其未來發展還是存在著兩個隱憂：首先是相對較位於邊陲的地理位置，將限制其政經與軍事影響的投射能力，其次是以相當於中國的人口結構，但平均所得卻在這六個潛在霸權國家中敬陪末座，以印度的經濟能量與成長速度觀之，這不啻暗示該國貧富懸殊的距離已成為足以埋下社會衝突根源的問題。

肆、未來：結構現實主義或自由制度主義？

在有關國際政治內涵變遷的研究上，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乃是不斷交織衝突的兩條主要的思考途徑。例如有許多學者認為，現實主義已然過時了，因為包括無政府狀態、自助與權力平衡等概念遭到嚴重挑戰；⁵¹而他們所以如此思考的歷史背景乃是冷戰終結與民主化浪潮幾乎同時到來的現實。根據 Doyle 的「民主和平論」看法，由於自由民主國家間是不會交戰的，因此戰爭此種傳統的衝突型態也即將隨著消失，⁵²至少 Russett 相信，只要民主國家的數量夠多，現實主義的原則絕非無法超越。⁵³但 Waltz 認為這不過是種「假設」而非「理論」。⁵⁴至於 Mueller 也間接支持 Waltz 的看法，他認為並非民主帶來和平，而是由於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擁有霸權者（英國與美國）都是民主國家，因此也強化了此種制度的主流性。⁵⁵一般認為，國際互賴（interdependence）可說強化了民主和平論的利益動機，因為它強調市場力量將逐漸超越國家權力要素。但事實是：互賴既會強化國家間聯繫，也會增加衝突的機會（例如兩次大戰的爆發），更何況互賴經常會出現不對稱的現象（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⁵¹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1997), pp.899-912;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ic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2(1999), pp.5-55.

⁵²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4(1986), pp. 1151-1169; Francis Fukuyama, "Liberal Democracy as a Global Phenomen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4(1991), p.662.

⁵³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⁵⁴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2000), pp.5-41.

⁵⁵ John Mueller, "Is War Still Becoming Obsole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1991, p.55.

從而也形塑了世界體系中核心與邊陲的糾葛。

無論如何，對於制度要素的忽視，向來是現實主義遭質疑之處；正如 Snyder 所指出的，如果沒有敵對威脅存在，則同盟根本沒有意義。⁵⁶但若從事實層面來看，有時目的並不重要，因為只要創造出一個組織，它便會自己找事情來做，例如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人員當然會想盡辦法去保護自己的工作不受冷戰終結的影響。儘管如此，現實主義者仍堅持，所謂國際制度的目標其實並非用來服務國際利益，而是國家利益；換言之，主要強國所以推動國際建制，其目的不過在於擴張自己的利益。正如制度論者 Keohane 與 Martin 所言，制度的概念化同時有賴於獨立與依賴變數的存在；⁵⁷Waltz 認為所謂依賴變數正是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的現實。進一步來說，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乃是國家間權力分配的反映，至於權力平衡則會不斷地被破壞然後再重建，問題只在於不曉得什麼時候會發生。⁵⁸至於透過戰爭來重塑平衡乃是個常見的想法，因戰爭的終結將扭曲平衡，而勝利的一方則負責重建平衡。不過，競爭的勝利往往會埋下憎恨，而勝利者也很難能夠寬宏大量，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乃家常便飯；⁵⁹因此，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為限制紛爭或避免發生激烈的衝突，政府勢必得調整並增加彼此間的「合作性交往」政策。⁶⁰

針對未來東亞霸權結構變遷的問題，前述兩種理論說法或許能提供我們若干思考的基礎。正如前述，現實主義者認為大國間的權力爭奪甚至爆發戰爭，乃是國際結構發生變遷的主要原因；從東亞區域的歷史看來（參考表 3），此種說法顯然具有相當程度的驗證性。不僅霸權建立經常是由於成功挑戰前任霸權國家的結果，霸權的崩解也往往來自不敵新挑戰者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它似乎暗示只要強權國家間出現權力差距縮小現象，便會給予挑戰者誘

⁵⁶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92.

⁵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1995), p.40.

⁵⁸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1(1999), p.5-41.

⁵⁹ John L. Gaddis,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40:1(1998), p.147.

⁶⁰ see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因，而現任霸權也必須用盡各種辦法來維持現狀。例如隨著中國權力呈現出繼續提昇的跡象，美國國防部與眾議院在 1999 年分別公佈的「亞太地區戰區飛彈防禦建構選擇方案報告」（TMD 報告）與「考克斯報告」，便透露出將中國視為假想敵的趨勢，⁶¹而 2000 年後的布希政府更將與中國間的互動，由「戰略合作夥伴」修正為「戰略競爭者」關係。⁶²不僅如此，美國也透過擴張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甚至納進印度洋與波斯灣地區），拉抬日本影響力以壓制中國的擴張，並自 1997 年後積極拉攏印度，作為從南方抵制中國的權力籌碼。不過，儘管美國前國務卿 Albright 曾聲稱：「無論現在或未來，美國都將是亞太地區無庸置疑的政治領袖」。但正如我們在前段中所述，包括中國、日本、俄羅斯，甚至印度等國，都顯然自有一套盤算。針對此種態勢，美國不僅得隨時維繫與東亞各國間的密切聯繫，同時必須預防在既有措施都達不到（維持霸權）目的時，應該把網張得更開以尋求新的安全合作夥伴。⁶³更重要的是，由於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潛在霸權國家，都將軍備更新與軍事影響力的擴張視為極重要的政策方向，因此列強間是否可能因為擦槍走火而導致霸權更迭的結果，乃是我們必須持續予以觀察的。

當然，東亞的區域結構變遷未必如現實主義者所預料般充滿火藥味。從國家間的合作面向來看，無論這些國際建制的發展具有平行協商性，還是由主要國家負責主導，包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東協區域論壇、亞洲博鰲會議、東協「十加一」與「十加三」會談，次區域主義發展（例如圖們江開發計畫、湄公河開發計畫與若干跨國經濟區的建立）以及連串的二軌或三軌對話機制的推動等，可想見的是，即便美國的影響力不再，進入「後美國時期」的東亞或許也不會因為霸權國家的消失而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紛爭當中。換言之，正如自由制度主義者的看法一般，無論「全球利益」等普世主義價值將取代國家利益的角

⁶¹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1999), pp.64-69;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Commercial Concer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x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elect Committee, 1999) .

⁶²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2000), p.66.

⁶³ see Zalmay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New York: Rand, 2001) , Chapter 4.

色，在理性選擇的自利主導下，國家也應該會更傾向於透過制度化的途徑來解決紛爭。至於這是否將是東亞國家的最終選項，則有賴於我們做更進一步的觀察。

